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普及丛书

新三字经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李存山 著

讲仁爱

重民本

守诚信

崇正义

尚和合

求大同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普及丛书 ·

新三字经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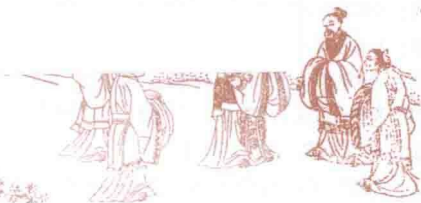
李存山◎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三字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李存山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5. 8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普及丛书)

ISBN 978-7-218-10324-2

I. ①新… II. ①李… III. ①社会主义建设—价值论—中国—通俗读物 IV. ①D61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82255 号

XIN SANZIJING YU SHEHUI ZHUYI HEXIN JIAZHIGUAN

新三字经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李存山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曾莹

书 法: 覃宇达

责任编辑: 张贤明 李展鹏

封面设计: 集力書裝 彭力
15620413547

责任技编: 周杰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东莞市本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5 字 数: 70 千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83793157 83795240 邮购: 020-83795240



编委会

主 编：胡 波 张 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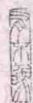
副主编：周 萍 赵金刚

编委会成员：

卢曙光 韩延星 周 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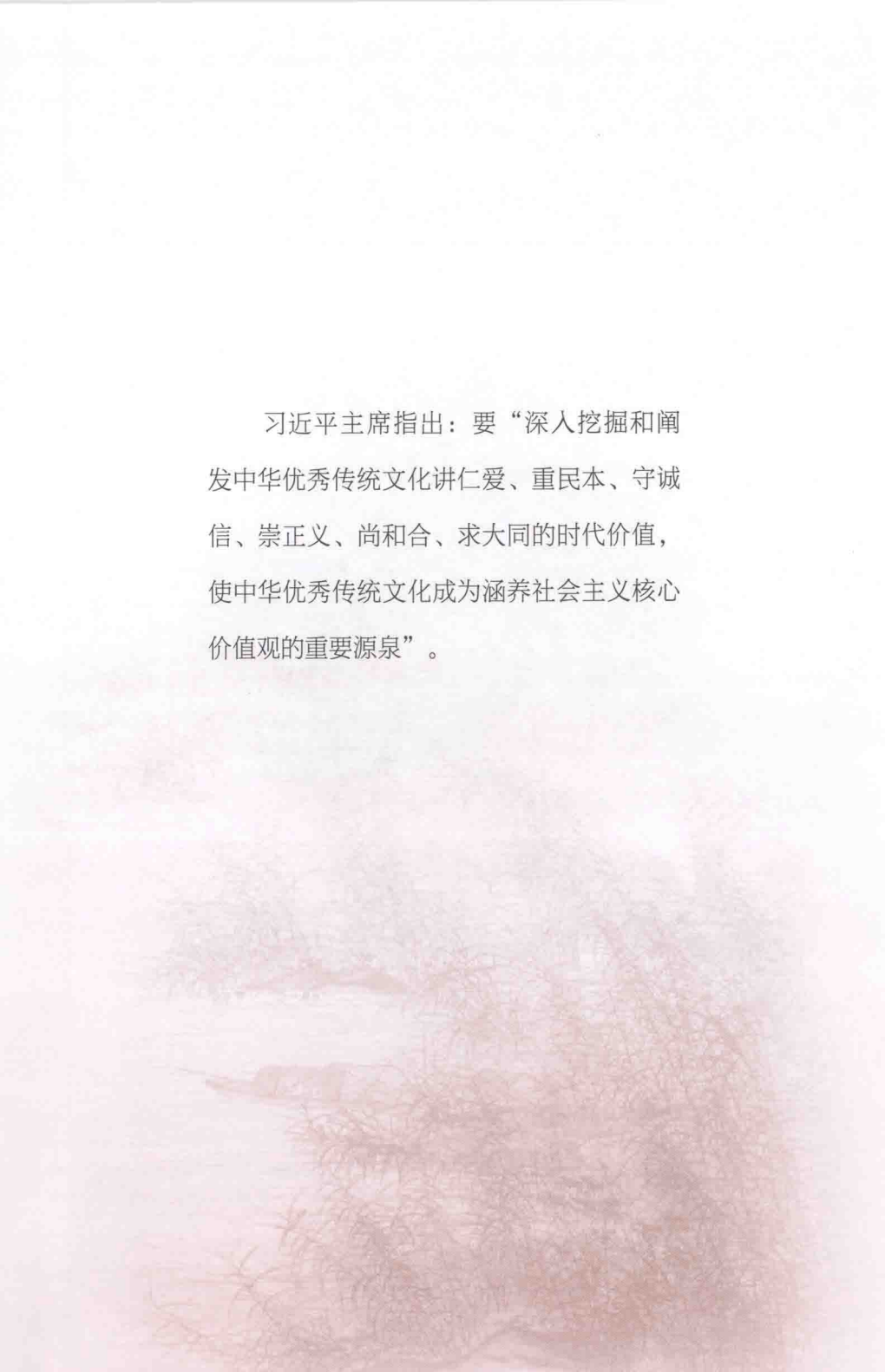
林洪英 杨立波

習近平主席指出。要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



字又全書





习近平主席指出：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自序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其中，他鲜明地提出了“四个讲清楚”，即：“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我认为，这“四个讲清楚”是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和文化建设的新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其核心要旨就是要在文化建设上“通古今”；只有“通古今”，才能有中国的文化自信，也才能真正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他特别强调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我认为，这里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确是对中华文化之精华的一个高度概括，可以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常道”或核心价值观，是需要我们传承和弘扬的，故而以“三字经”的形式对此作一阐发。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常道”，我认为重要的是要认识文化之“变”与“常”的关系。《论

语·为政》记载：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孔子所说的“因”，就是相因继承，即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亦可谓中国文化之“常”；而“损益”，就是减损和增益，即文化发展不同阶段的变化，亦可谓中国文化之“变”。子张问，是否十世可知也？孔子自信地回答，夏、商、周三代的文化（礼）既有相因继承，又有损益发展，以后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据古注“父子相继曰世”，一世为三十年，“百世”就是三千年。孔子对于中国文化的进程既有“因”又有“损益”的认识，是符合文化发展的辩证法的。在孔子之后的两千五百多年间，中国文化的发展确实是既有相因继承又有损益发展，而且我们至今仍处在孔子所说的“百世”之内。

在中国现代哲学思想中，对于文化的“变”与

“常”最先作出明确表述的是张岱年先生。如他在1935年发表的《西化与创造》一文中所说：

惟用“对理法”（按即辩证法），然后才能见到文化之实相……惟用“对理法”，才能既有见于文化之整，亦有见于文化之分；既有见于文化之变，亦有见于文化之常；既有见于文化之异，亦有见于文化之同。^①

这里说的“文化之整”，就是文化的系统性；而“文化之分”，就是对构成文化系统的不同要素是可以进行“析取”（分析择取）的。所谓“文化之变”，就是文化发展的变革、阶段性；而“文化之常”，就是文化发展的连续、继承性。所谓“文化之异”，就是不同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民族性；而“文化之同”，就是蕴含在不同民族文化之中的普遍性、世界性。

① 《张岱年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8—249页。

张岱年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参与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讨论，是基于唯物史观而对文化发展作出辩证的理解。如他在1933年发表的《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一文中说：“文化以生产力及社会关系的发展为基础，生产力发展到一新形态，社会关系改变，则文化必然变化。”“中国的旧文化既不能保持原样，那么，是否就要整个地将其取消呢？将其扫荡得干干净净呢？不！只有不懂唯物辩证法的人，才会有这种主张。”“文化在发展的历程中必然有变革，而且有飞跃的变革。但是文化不仅是屡屡变革的历程，其发展亦有连续性和累积性。在文化变革之时，新的虽然否定了旧的，而新旧之间仍有一定的连续性。”^①此即张先生关于文化发展的“变中有常”的观点。

张先生当时还发表了《道德之“变”与“常”》一文，他指出：

① 《张岱年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3、155页。

道德依时代而不同，随社会之物质基础之变化而变化；然在各时代之道德中，亦有一贯者在，由此而各时代之道德皆得名为道德。

新道德与旧道德之间是有连续性的，旧道德中有虽旧而仍新者存：于此当明道德之“变”与“常”的辩证法。^①

在纪念张岱年先生逝世三周年时（2007年），我曾写有《张岱年先生的两个重要理论贡献》^②，其中之一就是张先生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先提出了文化、道德的“变”与“常”的问题，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张先生最早把“和谐”纳入唯物辩证法的重要范畴，并将其作为最高的价值准则。我在那篇文章中指出，张先生的观点不同于对唯物史观的简单化、机械化理解，而他的观点是更符合唯物史观之精义的。

① 《张岱年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0—161页。

② 载《哲学动态》2007年第6期。

恩格斯在其晚年的书信中曾写道：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①

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5—486页。

恩格斯在这里说的不仅是“哲学”，而且包括“宗教”“文学”等文化因素。针对一些人对唯物史观的“形而上学”理解，恩格斯说：“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①而张岱年先生对文化问题的精辟见解，恰恰是体现了唯物史观中的辩证法的精义。

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积二三十年学习和参与关于文化问题讨论所得到的一个体会是，如果我们对文化的“整与分”“变与常”“异与同”的辩证关系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 and 把握，我们在文化问题上就不会有大的偏颇，对于处理文化的“古今中西”问题就会有一个大致正确的方向。

我曾作有《反思儒家文化的“常道”》^②，其中解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儒家文化的“常道”，认为“三纲”只是汉儒为了适应“汉承秦制”而作出的一种“损益”，它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6页。

② 载《孔子研究》2011年第2期。

“变”而不是“常”。真正的儒家文化的“常道”应该是从先秦儒家到秦以后儒家所一以贯之、始终坚持、恒常而不变、具有根本的普遍意义的那些道理、原则、理想或理念。以此为标准，如果从“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讲起，那么儒家文化的“常道”应该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等等。当时把“崇尚道德、以民为本”放在前面，是因为在《尚书》的《尧典》和《皋陶谟》中就已体现了这样的传统，而“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则是孔子把“仁”提升到道德的最高范畴，并且把“忠恕之道”作为一贯的“行仁之方”，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则是始于《尧典》的“黎民于变时雍”（雍者和也），以后儒家也一贯把“和”作为人生、社会乃至宇宙的理想状态（如《论语》中所谓“和为贵”，董仲舒说“夫德莫大于和……天地之道，虽有不和者，必归之于和”，张载以“太虚”即气的本然状态为“太和”，并且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深入挖掘和阐发“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我在当年3月参加一次学习习近平系列讲话的学术研讨会时就已认为，习近平的讲话符合文化发展之“变”与“常”的辩证法，他提出的“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确可以说就是中国文化的“常道”，是我们需要传承和弘扬的。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讲话中进一步肯定了儒家思想、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并且指出：对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我认为，这符合文化发展之“整”与“分”的辩证法。事实上，只有承认对传